

# 关于中国现代化试步时期的若干问题

吴 忠 民

对于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作者从现代化的理论视角进行了一番进程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化的试步时期，并肯定了其必然性及其历史作用，总结了一些进展特征，并指出了对其后的现代化发展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作者：吴忠民，男，1959年出生，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大致的说，1949—1978年这30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试步时期。之所以称之为“试步时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这一时期，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行为带有一种明显的探索的色彩，现代化模式尚未被确定下来，这一时期具体发展战略的改换也过于频繁，所以，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的摇摆度比较大。

这一试步时期在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一方面，它为后来的现代化阶段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为后来的现代化阶段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现代化建设不规则的高速度推进。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经济实力的高速增长。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为1015亿元，国民收入为589亿元，1978年则分别增至6846亿元和3010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及国民收入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8年分别为726.3和453.4。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1978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7.9%，国民收入增长率为6.0%，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0%。应当承认，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同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一比较。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例，1960—1969年，美国为4.1%，日本为11.2%，印度为3.6%；1970—1981年，美国为2.8%，日本为5.2%，印度为3.9%。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1960—197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2%，1970—1977年为3.7%。以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例，1961—1970年，苏联为7.2%，波兰为6.0%，民主德国为4.4%，捷克斯洛伐克为4.4%，匈牙利为5.4%，罗马尼亚为8.3%，保加利亚为7.6%；1971—1980年，这些国家分别为4.9%、5.4%、4.7%、4.6%、4.9%、9.2%、7.0%。<sup>①</sup>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期确实居于世界的前列。

第二，发展过程中的低效性。综观这30年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靠外延型的发展方式而并非内涵型的发展方式去推进的，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发展过程中的低效性。这种低

<sup>①</sup>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奋进的四十年》；《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近代国际经济要览》（宫崎犀一等编）。

效性首先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高成本低效益。物质消耗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呈逐渐增高的趋势：“一五”时期为44.3%；“二五”时期为50.8%；1963—1965年为48.6%；“三五”时期为48.1%；“四五”时期为51.8%；“五五”时期为56.1%。全民所有制单位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逐渐减少：“一五”时期为29.4元；“二五”时期为29.4元；1963—1965年为16.5元；“三五”时期为18.9元；“四五”时期为18.7元；“五五”时期为15.5元。<sup>①</sup>这种低效性还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中国1952年—1982年期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总的来说比较低，虽然有的部门和有些时期的成绩要比另外一些部门和时期要好。”<sup>②</sup>按可比价格计算，工业劳动者的平均净产值的指数在1952年为100，1978年为409.3；农业劳动者平均净产值的指数在1952年为100，1978年仅为102.9。<sup>③</sup>总之，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很小，无法同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相提并论。

第三，产业结构很不合理。这集中表现在农轻重关系的严重失调。在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显然是放在重工业方面。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把发展工业的重点放在重工业的建设上是有道理的。只有将重工业基础打牢，方可有效地装备农业和轻工业，带动农业和轻工业的现代化。但是，就我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的具体进程而言，无论是从基本建设的投资来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来看，农轻重三者的比例过分悬殊。以投资总额为100，农轻重三者的比重分别是，“一五”时期为7.1:6.4:36.2；“二五”时期为11.3:6.4:54.0；1963—1965年为17.6:3.9:45.9；“三五”时期为10.7:4.4:51.1；“四五”时期为9.8:5.8:49.6；“五五”时期为10.5:6.7:45.9。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产值指数在1952年均为100，按可比价格计算，到1978年，农业产值指数为199.8，轻工业产值指数为1005.2，重工业产值指数为2879.5。<sup>④</sup>重工业比重如此之大，必定会导致大幅度减少农业和轻工业赖以发展的资金，从而使农业和轻工业不能得以顺利的发展。问题还不止于此，重要的是重工业本身的结构也不合理，属于自我服务型结构。重工业对于农业和轻工业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例如，1952年—1979年，国家在重工业投资中用于农机、农药、化肥的比重只有8.5%。<sup>⑤</sup>除了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之外，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其他社会生产部门如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发展的相对缓慢。以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三者产值指数在1952年为100，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到1978年，建筑业的产值指数为995.5，运输业为700.9，商业仅为344.8。<sup>⑥</sup>

第四，个人经济收入增长率过低。在这一时期，个人经济收入的增幅很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了1978年，实际工资指数只有110.3。<sup>⑦</sup>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幅度也是比较低的。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增至177.0，其中农民为157.6，非农业居民为212.6。<sup>⑧</sup>再来看一下个人的储蓄额。1978年，

① 《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87页。

②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出版社，第37页。

③ 《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81页。

④ 《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66、57页。

⑤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第120页。

⑥ 《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45页。

⑦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51页。

⑧ 《奋进的四十年》，第456页。

城镇人均存款余额只有89.8元,农村仅7.0元。<sup>①</sup>个人经济收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幅度无论是同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幅度相比,还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相比,都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

第五,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起伏。回顾这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着明显的起伏性,而且,这种起伏表现为一种比较固定的轮回周期,即:高速增长→经济滑坡、善后处理→再高速增长→再经济滑坡、再善后处理……。在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增长率往往达到高峰,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进而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源、资金供给的紧张,财政开始出现赤字。于是,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只能将增长速度降下来。这时,必然地要过渡到经济滑坡、善后处理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投资规模急剧变小,资源、资金供给的紧张状况开始缓解,轻工业开始被重视,消费额所占比重开始增大。待到经济状况恢复正常状况之后,便又开始了新的高速增长阶段。在连绵不断的起伏周期中,以1958—1962年的起伏周期最为典型。195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从1957年的151.23亿元剧增到279.06亿元,增长速度为84.5%;1959年,再增至368.02亿元,增长速度为31.9%。<sup>②</sup>高投资带来了产值的高增长:1958年社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32.6%,其中工业产值比上一年增长54.8%;1959年社会总产值又比上一年增长18%,其中工业产值比上一年增长36.1%。<sup>③</sup>这些,又造成了财政赤字的出现:1958年,财政赤字为21.80亿元,1959年为65.74亿元,1960年为81.85亿元。<sup>④</sup>随后的两年(1961、1962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滑坡:以上一年的社会总产值指数为100,1961年社会总产值的指数为66.5,1962年为90.0。<sup>⑤</sup>经过一系列善后措施的实施,1963年,经济又开始回升,开始形成新的起伏周期。

这一时期经济不规则的高速增长这一突出特征,对于当时乃至以后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二

中国的现代化在试步时期除了具有经济不规则高速推进这一突出特征之外,还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 1. 社会分化的相对不足。

所谓社会分化,一般是指社会机体本身伴随着经济现代化过程的推进而日益形成众多的差异或专门化的社会分工。任何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必然地会出现社会分化现象,尽管在时间上可能有迟早之分。

相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言,中国在这30年的社会分化无论是就其程度还是就其速度而言,都是不足的。

社会成员的分化度很小。当时,社会群体非常简单,这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群体内部构成的同质性(单一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社会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简单性。简单的社会群体直接规定了社会成员分化的不足。社会成员的位置具有着不变性和固定性的特征,个人的选

① 《中国社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第93页。

② 《奋进的四十年》,第354页。

③ 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51页。

④ 《中国财政统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5页。

⑤ 《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51页。

择余地很小。

区域分化也明显表现出一种相对不足的情形。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区域分化趋势比较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区域在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增大,也表现在不同区域中的个人收入之间差异的增大。到现代化的中期阶段,由于社会流动程度的增大,各区域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有可能开始减小,但各区域作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其差异仍难以消失。中国在这30年当中的实际情况则很特殊。区域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但各区域的自主权却比较小,上一级权力机构对所辖区域统得过死。“大跃进”期间曾试着下放一些权力,增大各区域的自主权如计划决策权、基建审批权、物资分配权、财权等等,以期迅速建立协作区和各省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操之过急,缺乏必要的过渡,因而造成了各区域内部以及各区域之间相互关系的混乱。于是,很快又将前述权力收回。不能否认,区域自主权的弱化,有利于中央政府举办一些大型工程,并有力地扶助一些落后区域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度的“抽肥补瘦”,造成区域分化相对不足,使本来具有一定潜力的区域得不到应有的充分发展。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各区域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基本上没有拉开。1952年,绝大部分省区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00元以内或100—200元之间。到1978年,大部分省区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0—300元或300—400元之间。<sup>①</sup>另一方面,在各区域之间,作为个人收入重要表现的个人消费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小。比如,1952年,江苏省居民消费水平为74元,陕西省为72元;到了1978年,江苏省居民消费水平为187元,陕西省为155元,<sup>②</sup>区域之间个人收入的这种较小差距,是在社会流动程度很低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不能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 2. 现代知识和教育发展的相对迟缓。

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知识和教育还是现代化进程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有用知识贮存的这种高增长率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按人口平均产值及生产率的进一步高速增长来说,即使不是充足的条件,也是必需的条件。”<sup>③</sup>有人作过统计,日本在1930—1955年这段时间的国民收入总增长部分中,约有25%是由于增加教育资本而取得的。<sup>④</sup>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发展更为重要,否则,无法形成有效的再创造能力,甚至无法形成有效的汲取能力。

应当承认,在现代化试步阶段的这30年,中国的现代知识及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技术及教育的体系;培养了大批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社会成员;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不能否认,同经济较高速度的发展相比,中国的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发展是相对迟缓的,而且,存在着不少问题。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于现代知识和教育的总投入相对不足。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低,而且,略呈减小的趋势:1952年为1.87%,1955年为2.41%,1960年为4.14%,1965年为2.85%,1970年为1.43%,1975年为2.64%,1978年为3.12%。<sup>⑤</sup>教育事业的基本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数的比重也很小。同样也是呈逐年减小的趋势:1950—1952年为4.8%,1953—1957年

① 《奋进的四十年》,第343页。

② 《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218、346页。

③ [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第335页。

④ 冯之浚等:《现代化与科学学》,知识出版社,第40页。

⑤ 《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第87页。

为2.8%，1958—1962年为1.5%，1963—1965年为2.1%，1966—1970年为0.5%，1971—1975年为0.8%。<sup>①</sup> 科学研究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虽然略呈增高的趋势，但仍 在低限度之内：“一五”时期为0.36%， “二五”时期为1.78%，1963—1965年为1.97%， “三五”时期为1.36%， “四五”时期为1.61%， “五五”时期为1.72%”。<sup>②</sup>

第二，现代知识和教育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平均每万名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在1952年为269人，1960年为390.4人，1978年为593.3人。<sup>③</sup> 就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而言，1952年分别为19.1万人和63.6万人，1955年分别为28.8万人和53.7万人，1960年分别为96.2万人和221.6万人，1965年分别为67.4万人和54.7万人，1970年分别为4.8万人和6.4万人，1975年分别为50.1万人和70.7万人。<sup>④</sup> 如果扣除全国总人口增长的因素，高校在校学生数的增长率显然是比较低的，而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则基本上是在负增长的状态之中。

### 3. 开放的低限度进行，而且摇摆度过大。

对于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开放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1）对于这个国家的原动力、动能释放的启动作用；（2）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参照；（3）直接引入国外的某些先进的东西，以有效推进这个国家的发展。开放的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开放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因而有可能阻碍该国家的正常发展。如若忽略了对于国家原动力、动能的启动，那么便会使这个国家的发展缺少一种超越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外某些先进事物的直接引进，有可能造成本民族的某种不适，形成大量的离心因素。如果忽视了必要的参照借鉴，那么，开放的结果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得以释放的民族原动力、动能，由于找不到合适路径予以兑现，因而成为一种浪费，或者是只起了一种事倍功半的效果，甚至造成一种有害的力量从而有损于该国家的长远发展。如果忽视了开放的第三层意义亦即对于国外某些先进事物的直接引进，那么，开放的前两层意义的实现将因缺乏一种有效的推动而变得缓慢下来。

对于任何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而言，开放既是一种必要的前提条件，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各个国家甚至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开放的具体模式之间可能会有些差异，不宜一概而论。

从中国这30年的开放过程来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中国原动力、动能的启动已近于达到极限，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开放的第一方面的意义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的作用并不一定很重要。我们应将评价的重点放在开放的后两层意义上。就此而言，中国的开放只能说是低限度的，对于现代化过程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在50年代，中国的开放可以说是一面倒，开放的重点放在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对于西方国家，则基本上是形成了封闭的态势。当时，苏联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是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来看，还是从推进方式来看，苏联模式的痕迹随处可见。就是在直接引进方面，苏联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以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例，从1952年到1960年的各年份分别为19.4亿美元、23.7亿美元、24.4亿美元、31.4亿美元、

① 马洪主编：《2000年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4页。

② 《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第84页。

③ 《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00页。

④ 《奋进的四十年》，第435页。

32.1亿美元、31.1亿美元、38.7亿美元、43.8亿美元、38.1亿美元；<sup>①</sup>其中，同苏联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约为10.6亿美元、12.6亿美元、12.9亿美元、17.9亿美元、15.2亿美元、13.6亿美元、15.4亿美元、21亿美元、16.6亿美元、几乎每年都占了中国全部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如果再加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在全部贸易总额中占有绝对压倒优势。再如，当时中国出外学习人员也主要是前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在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开放过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边倒的局面已不复存在。60年代开放的第二方面的意义亦即寻求参照借鉴，在中国基本上已不存在，而且，对于国外某些先进事物的直接引进的势头明显减弱。中国的开放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中断了。深闭固拒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色。7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的开放虽然在参照借鉴方面做得依然不够，但在直接引入方面开始较大幅度的增强。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例，1970年为45.9亿美元，1978年则增至206.4亿美元。<sup>②</sup>

#### 4. 社会的相对稳定。

就通常情形而言，现代化的前期阶段，是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这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错综复杂，造成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过度城市化、贫富差距悬殊、失业现象突出、社会失范、犯罪率急剧上升等等，进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同许多国家的这一时期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试步阶段并未造成过多的社会问题，因而社会在1966年之前，是相对稳定的，这也同中国在经济方面的高起伏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文革”时期，社会显然是处在动荡状态之中，但究其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现代化过程本身所造成的。

中国在1966年之前社会的相对稳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社会问题的种类较少，其危害程度也较低，不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许多在别的国家曾出现过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虽然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某些不正常的现象，但很快便被消除，因而没有造成过度城市化问题。中国没有出现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各个阶层收入的差距是在不断的缩小，而并非增大。例如，1978年，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收入为316元，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134元，两者差距为2.4倍，这远远低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sup>③</sup>中国不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如1978年，中国城镇待业率只有5.3%。<sup>④</sup>另外，当时从总体上看，中国也并不存在着社会失范及高犯罪率问题。人口问题的酝酿虽然始自这一时期，但对当时来说，尚未形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二，社会具有高强度的控制能力，可以有效地化解异常性的变故，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1960年由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挫折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曾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危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到了影响。例如，当时的全国死亡率由1959年的14.59‰骤增至为25.43‰，致使中国出现了自建国以后唯一的一次人口负增长。<sup>⑤</sup>正是由于社会的高控制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补救，化解了这种危机，从而避免了一次可能的社会动荡。

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相对稳定，具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对于以后来说，很难

① 《奋进的四十年》，第417页。

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第IV—69页。

③ 《奋进的四十年》，第417页。

④ 何建章等：《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07、544页。

⑤ 《中国社会统计资料》，第39页。

⑥ 《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90页。

具有重复性。

### 三

诚如前面所谈及的那样，同许多国家现代化的前期阶段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在试步时期具有着很不相同之处。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总的看来，在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占据时代的中心位置。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则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的中心任务。前者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后者。

这一时期，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并将之视为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起初，人们将现代化与工业化等同起来。1953年毛泽东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sup>①</sup>在这之后的几年当中，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如，中共“八大”的决议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sup>②</sup>从1957年开始，现代化这一提法逐渐盛行起来。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sup>③</sup>1963年，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sup>④</sup>1964年，周恩来再次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sup>⑤</sup>至此，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开始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型式：“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奋斗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政治运动逐渐频繁、升级和强化，以至逐渐成为实际上的中心任务，亦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在1956年确实将现代化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内容，但时隔不长这一局面便告结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sup>⑥</sup>

也正因为如此，日益强化的政治运动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经济发展战略的频繁改换。必须看到，“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sup>⑦</sup>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断地强化政治运动，势必会更加不遵循经济建设本身的规律，使经济发展战略从属于政治运动，因而经济发展战略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而不断地频繁改换。比如，从1958—1962年的四年时间，主要是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断改换，其速度之快、改换幅度之大，在今日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本来，经济发展战略尽管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确实也存在着一个不断更新的问题。问题在于，这种更新应当是新旧战略之间的相互衔接，是新战略对于旧战略的进一步补充。由是观之，

① 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704页。

② 《人民日报》社论：《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人民日报》1956年9月29日。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4页。

④ 周恩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⑤ 周恩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⑦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的频繁改换是不恰当的，因而难免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影 响。

第二，在所有制方面不切实际地追求高纯洁度。当时，人们往往容易将所有制的变更视为目的，而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从属性的东西，认为，只要所有制有所进步，那么，社会生产力也必然会随之发展；生产的规模会扩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会提高。于是，并非偶然地，人们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即：社会主义所有制所包括的范围越大越好，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以后，中国还不断地对一些集体所有制搞升级及合并，对个体经济则予以大规模的取消或限制。到1978年，城镇职工人数为9499万人，其中城镇个体劳动者为15万人，两者比例为633:1。<sup>①</sup>其公有化程度之高，范围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把现代化建设主要限制在经济和自然科学及技术的领域。当时，人们实际上是将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等同在一起。前面曾谈到，到60年代，人们对于现代化内涵的认识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型式：“四个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两个现代化属于经济领域，一个现代化实指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现代化。之所以如此，不能不说这同频繁的政治运动有直接的关系。过多的政治运动，很容易使人们形成这样两个概念，一个观念是，中国的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非经济领域无疑是先进的，因而不存在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另一个观念是，既然中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而社会科学也就不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技术只限于自然科学与技术。前一个观念的偏颇在于，它没有看到在非经济领域确实同样也存在着现代化的问题；后一个观念的偏颇在于，它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与社会科学之间划上了等号，而指导思想本身并不能代替社会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存在。重要的是，人们把这两个带有明显偏颇性的观念直接用来指导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这就必然会对现代化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

#### 四

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中国这一时期现代化进程诸项特征得以形成的另一重要根源。

所谓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

中国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社会动员的范围之大，社会动员的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

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空前的社会动员，决非偶然之事，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及社会原因的。其一，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统一。从19世纪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90年间，中国饱受外国侵略者的侵害，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之中，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因此，“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sup>②</sup>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独立，获得了统一。中国民众由此形成了一种激昂的民族自豪感。其二，社会的重构。在50年代前期，中国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重构工程，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了沿续了数千年之久的私有制，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1949年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和在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广泛的一致性进一步促进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sup>③</sup>其他劳动阶层的社会成员如工人、农民也摆脱了旧有的束缚，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而且，妇女地位也在

① 《奋进的四十年》，第449页。

② [美]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9页。

③ 同上书，第59页。

迅速提高，自身也得到相当的解放。于是，人民大众积极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浪潮之中。整个社会面貌一新。其三，民族解放运动的惯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间，民族解放运动在不断的高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民族动员、民众动员达到了高潮。民族解放运动所具有的特性并没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即刻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作为一种历史惯性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新中国社会动力的一个重要源头。其四，国际上的压力。在5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阵营严峻对峙；到60年代，则是中苏、中美之间的对立。严峻的国际形势，不能不使中国民众的民族整体感特别地突出出来。总之，在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统一、社会重构、民族解放运动的惯性以及国际压力种种条件之下，当时的中国人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这就使当时空前的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毕竟还不是现实，尚需要进一步的转换方能成为现实。而在当时，又恰恰存在着有助于这种转换的两大杠杆。一个杠杆是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毛泽东的崇高的威望和地位，而且，毛泽东本人又特别地重视人本身的解放、偏爱群众运动。另一个杠杆则是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对于各区域、各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极为有效。领袖人物的人格崇拜与执行系统的有效，最终使空前的社会动员在当时成为一种现实。

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当时，几乎在所有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知识等领域里都曾进行过社会动员。就连农村的扫除文盲的举动，也往往是通过社会动员来完成的。现在我国文盲率远远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罗马尼亚、埃及、印度等国家，不能不说这同当时农村文化领域的有效社会动员没有直接关系。<sup>①</sup>其二，规模大，程度高。这一时期的许多次社会动员，几乎都是全民动员、全国动员。比较典型的一次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强调“以钢为纲”，各个行业都必须为此让路。全国累计有9000多万劳动力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全国新建了上百万炼钢炼铁土高炉。<sup>②</sup>其三，持续时间长。从1949—1978年的30年间，社会动员几乎没有中断过，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只要我们历数一下这30年间所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就不难发现，社会动员同其中的大多数相伴随。其四，总体上的可控性。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有时过于情绪化，而难以控制。但总的说来，还是具有秩序性、可控性的。

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中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动员中，社会成员的主体能力能够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空前的社会动员意味着空前的劳动量的投入，因而经济的现代化便获得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在空前的社会动员中，人们的道德取向、价值取向、信仰以及行为方式很容易融为一体。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资金的高积累。而高积累又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的重要原因。

空前的社会动员很容易造成经济效益的相对低下。正如前面所谈及的那样，在空前的社会动员中，人们往往是靠劳动投入的总量来取得较高的产值。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社会成员并不很重视劳动生产率问题，并不很重视技术的革新，不重视自身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的提高，而热衷于搞人海战术、大会战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于是，平均单位时间的产值问题便很难为人们所看重。既然如此，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产值提高的幅度远远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不难理解经济效益为什么一直是相对低下的。

如果把握不当，空前的社会动员还容易增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摇摆度。在现代化的前期

<sup>①</sup> 《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866页。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第485页。

阶段，发展基数比较小，这时，如若成倍地增加劳动的投入量，那么，发展的结果很容易明显增大。在中国现代化的试步时期，恰恰属于这种情况，因而很容易使人们头脑发热，使人们对于发展的指标定得过高。不切实际地追求发展的高速度，过于脱离国情，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大的摇摆程度。

空前的社会动员只要没有失去控制，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空前的社会动员，意味着社会向心力、凝聚力的高效性，意味着社会离心因素的过少，意味着社会中异质成分的减少，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共识容易形成。所以，社会问题得以产生的机会就被减少了。空前的社会动员也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整体力量，而这种有效的社会整体力量可以消除至少可以缓解现实中的一些社会问题，使其危害消失或是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关于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还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就其趋势而言，它逐渐与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合流。在50年代，社会动员多是同与现代化有关的内容相关。但从60年代前期开始，这种情形便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时的社会动员多是同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相联。于是，这就从两个方面对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化进程本身的推动力量开始减弱。另一方面，则是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互感、互诱，社会动员被滥用，以至于最终失去了控制，从而直接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甚至在某个时期使现代化进程中断下来。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动员的积极效应是同社会动员投入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的程度恰恰构成了反比关系，而其负效应则与之构成了正比关系。当然，问题还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社会动员仍可能与一些经济内容相关，如“农业学大寨”运动。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包含有一定经济内容的运动从总体上讲，其重心仍是政治运动，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比如，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济居于次要地位，其主流是所谓的“路线问题”。其二，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对以后的现代化过程也会产生间接的深远影响。由于特殊的时代条件，这一时期的社会成员被高强度地、而且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动员起来，于是，这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60年代始，由于社会动员所形成的负向效应过多，因而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不能不深受影响，社会动员后来几乎是靠一种惯性支撑着，所以，一旦原有的时代条件开始变更，那么这一空前的社会动员便会迅速冷却下来。另一个问题是，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动员的高强度性，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几乎全被耗尽，因此，若要形成新的社会动员，就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使社会成员们经过必要的休整，方可重新酝酿生成。可见，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后来的社会动员的力度，并延缓了其重新形成的时间。

## 五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30年间存在着不少问题，尽管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是，必须看到，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50年代前期，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社会重构的艰巨任务，为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作了必要的铺垫。从1956—1966年，中国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并为此而奋斗。虽说出现过类似于“大跃进”的失误，但毕竟于60年代初期被纠正了，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并没有完完全全地贯彻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之中，因此，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比较长足的进展。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现代化建设也在断断续续的进行。这一切，

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基础：“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这一点，即一九四九年以来工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都增长很快。……中国在发展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其他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和印度等大得多，而且这些国家还比较自由地接触到了外国的专长和技术、任意接受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sup>①</sup>“在奔向现代化的竞赛中一再落后于日、俄之后，中国在50年代终于开始比她的两个领先的邻国跑得更快了。”<sup>②</sup>“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sup>③</sup>

从1978年末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何才能顺利地推进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使之健康地展开，而尽可能地少走弯路？这方面，中国在试步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必须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因为如此，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宣告，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sup>④</sup>这标志着历史的巨大转折。这一转折确实来之不易，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得到的。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人们的观念和实际行为，真正实现这一转折，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否则，现代化建设仍有可能无法正常、顺利地进行。

第二，用有效发展模式来取代高速增长模式。中国现代化在试步时期的32年间，是采取了经济高速增长模式，极力追求产值的迅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现在到了必须改换这种高速增长模式的时候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取而代之的应为何种模式呢？毫无疑问，应是有效发展模式。有效发展模式旨在建立起发展的内在生长机制，注重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之间的共生性以及发展推进的有效性，注重发展结果的较高效益和较好的效益。总之，唯有有效发展模式，方可成功地推进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正确地组织和利用社会动员。社会动员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怎样组织并使用社会动员，会对现代化整个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化试步时期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其一，社会动员必须同现代化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社会动员方可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其二，必须“适度”地启动和使用社会动员。空前的、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方可形成。而这种特定历史条件往往具有着不重复性。另外，社会动员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律和周期性。当一次社会动员的高潮过去之后，往往需要缓一段时间，社会动员方能够重新酝酿形成。因此，不宜在任何时期都去一味地追求高强度的社会动员。而且，对于社会动员的运用一定要得当，而不能滥用，否则，非但会造成一种浪费，还极有可能对于现代化进程直接造成许多不利的影响。

责任编辑：张宛丽

①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330页。

②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50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